

——

“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对高等学校工作的指导意义

——

楊西光 刘佛年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对高等学校工作的指导意义

楊西光 刘佛年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对高等学校工作的指导意义

楊西光 刘佛年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耀興路 54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01 號

上海土山灣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1 字数 17,000

1958 年 9 月第 1 版

195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0

统一书号：2074·115

定 价：(6)0.10 元

封面設計：任 意

目 录

两类矛盾学說指導我們在知識分子

思想改造工作中取得了胜利 楊西光(1)

社会主义民主与教育 劉佛年(9)

兩類矛盾學說指導我們在知識分子 思想改造工作中取得了勝利

楊 西 光

黨在科學文教事業中，一直面對着一個團結、改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問題。

中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要在短期內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需要把一切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過去積累了知識，其中絕大多數人又都願意為社會主義祖國服務，因此，我們就要發揮他們的作用。但是，他們因為受了過去那種社會環境的支配，浸透了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各種偏見。以復旦大學為例，教授、副教授中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的占66.05%，出身于工人、貧僱農家庭的一個也沒有。他們都受過系統的資產階級教育，有58%的人到資本主義國家留過學，在舊社會中，又大多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其中不少人本人原來就是反動統治時期的當權派和地主、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還用各種辦法頑強地反映出他們的思想意識來，散播着這種思想的影響，由於整個社會的條件，這種影響還會長期地存在。這就是說：他們在給工人階級帶來專門知

識的同时，也带来了毒草。为了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真正为工人阶级服务；为了清除文教科学事业中资产阶级的各种影响，按照工人阶级思想来发展文教科学事业，就要求我们在发挥他们的作用时，又要改造他们，同他们进行斗争。

整风运动这一年，在科学文教战线上，一方面是批判并克服我们自身的三风五气、处理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的一年；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斗争的一年。在科学文教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充满着工人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尖锐的斗争。这个斗争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去年5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一小撮右派分子在高等学校中对党、对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特别在学校党的领导、教学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问题上对我们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绝大多数处在中间状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动摇于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基本上还是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他们有着两面性，其中的一面和右派分子是相通的。这时就乘机发洩个人对党的若干不满，呈现了严重的动摇，陷入混乱局面。复旦大学一位教授在民主党派一般整风检查时说：“以前是三心两意跟党走、七上八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分析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应该补充一句：“从内心说，更依恋的还是资本主义。”十分明显，如果对中间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不进行根本的改造，要巩固党在科学文教事业中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这个斗争表现在思想上就是走无产阶级集

体主义道路，还是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他们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出发，表现为严重的个人名利思想、脱离政治倾向、知识分子优越感、甘居中游思想等等。他们公开宣传：“不问政治搞冷门，容易成名成家”“一篇论文碰响了，不怕名利不上门”“只要熟读某几门书，就可以和专家学者随便攀谈，要不了几年可以当讲师、教授”“搞政治要有搞政治的才能，我们搞科学的人是不能搞的”“牛角尖里别有洞天”等等。这些思想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年中有着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写道：“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在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正是首先通过他们的知识分子来同我们进行斗争的。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般没有直接进行剥削，有知识，有较大的社会影响，这些条件都加强了他们同我们进行斗争时的地位。这个矛盾，在新的形势下已经日益上升为科学文教事业中的主要矛盾。我们必须在这场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不能有丝毫的妥协和退让。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这场斗争还表现在学术上，那就是资产阶级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保守的、唯心的学术观点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革命的、批判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学术观点的斗争；还表现在教育上，那就是培养青年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同引导青年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之间的斗争；还表现在教育制度和方法上，

那就是我們要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冲破过去资产阶级的一套教育制度和方法，而他們則要阻碍这种改革，这两者之間的斗争。

所有以上各个方面的斗争，归根結蒂，是用工人阶级思想来办科学文教事业，还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来办科学文教事业的問題；是由党、由工人阶级来领导科学文教事业，还是由资产阶级专家来领导科学文教事业的問題；是使科学文教事业这个上层建筑，积极地帮助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形成和巩固，还是起相反作用的問題。在高等学校中，这是一場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一場尖銳、激烈、反复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在这場斗争中，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者，作为剥削阶级的重要組成部分，成为我們党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对手，是十分明白的。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本身的兩面性，由于我們政治上的胜利和建設上的胜利，由于我們对资产阶级知識分子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这場斗争一般地是約束在一定范围之內的。有对抗性的一面，也有非对抗性的一面。現在，他們普遍承認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承認自己需要改造。因而它还是人民内部性質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写道：“在我們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屬於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屬於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根据我們的領会，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是属于同样

性質的斗争。毛澤東同志的文章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两點：第一，这里有着一場階級斗争；第二，這場階級斗争，一般地又是屬於人民內部的階級斗争。如果我們不能認識并掌握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这个矛盾的性質，我們就无法正确地處理這個矛盾，而会犯右的或“左”的錯誤。这样一个比較复杂的問題，在我們的实际工作中是早已碰到的，但是过去由于我們对这个斗争的性質還認識不足，有些同志对党团结、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就产生片面的理解，存在着怕教授的迷信心理，党的工作沒有深入到教学、科学研究工作中去，沒有放手对資产阶级知識分子发动群众性的尖銳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个别的共产党员甚至本身还做了他們的思想俘虏。而另一些时候，有些同志对他们的改造又存在急躁情緒，采取了一些生硬、粗糙的做法，因而不能很好地解决他們的問題。直到毛澤東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发表，又經過这一年來整风运动的实践，我們才更加明确地找到了方向，进一步积累了处理这个矛盾的經驗。

因为我們同資产阶级知識分子之間的階級斗争，在具体进行斗争时就需要考慮到两个方面的問題：因为这是一場階級斗争，我們在斗争中就要划清界綫，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大破大立，达到灭資兴无的目的；又因为这是一場人民内部的階級斗争，我們在斗争中又必須采取摆事实、講道理，揭露对立面，进行细致的思想斗争的办法，不能用粗暴的強制的办法。事實証明只有这样，才是最有效果的做法。

這場斗争发展的前途怎么样？資产阶级知識分子既然是

工人階級在科學文教事業中的對立面，那末，它們本身的前途又怎樣？

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轉化的學說精辟地、科學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寫道：“矛盾着的對立的雙方互相鬥爭的結果，無不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在這裡，條件是重要的。沒有一定的條件，鬥爭着的雙方都不會變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同工人階級鬥爭着的相對立的一方；但在一定條件下，却又可能轉化為工人階級隊伍中的成員，從而成為同一。還是以復旦大學為例，教授、副教授中原來幾乎全部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經過解放幾年來的教育，在反右派鬥爭前，左派與中左分子就已占26.24%，現在這個數字更已上升到39.01%並且還在繼續增長中。我們在掌握了毛澤東同志科學的辯証法思想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轉化的根據和條件。我們是這樣理解的：絕大多數中間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由於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的兩面性，就使他們有可能轉化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後，他們原來依附的社會基礎已經失去了，如果不好好地改造自己、為工人階級服務，就無所依靠，別無前途。整個國際形勢、國內形勢以至他們工作所在單位的形勢，都按照着有利於工人階級方向飛躍發展，使他們深深感到形勢逼人，不得不改；黨對他們又採取着團結——批評——團結的正確政策，使他們看到自己如果好好改造，仍然有著及其光明的前途；這就是他們有可能轉化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條件。我們如果看不到這個矛盾轉化的可能性，就會

犯“左”的錯誤；我們如果看不到只有在一定條件下，這種矛盾才會轉化，從而放鬆了我們的努力，那就会犯右的錯誤。不管是“左”的錯誤還是右的錯誤，其結果都將使原來可以向着有利於工人階級方向轉化的矛盾向着相反的方向轉化。

當然，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一定也會有一部分人始終拒絕黨對他們進行的改造，但是正如毛澤東同志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中所寫的那樣：“至死不變，願意帶著花崗岩頭腦去見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他們中間，在一定的氣候下，還會出現一些新的右派。我們同右派分子之間的鬥爭還會經過若干反復。但那畢竟也只會是少數。我們一定要清醒地估計到這些因素，始終保持警惕。但是，我們也應該有這樣的自信，相信在黨的領導下，他們中間的多數人是可以改造成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當然，這種改造是要經過若干反復的，而且政治上、思想上、學術觀點上的改造，也並不是一次可以解決的。

經過這一年來的工作，我們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現在，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已有了很大的變化。他們普遍制訂紅專規劃，表示要把心交給黨，把知識交給勞動人民，改造自己成為紅透骨髓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在最近總路線的宣傳活動中，許多老教授扛着紅旗，上街宣傳，有的還在外灘、人民公園一帶說相聲、拉洋片、演活報。這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說，確實是不容易的事。現在，他們又正在普遍表示要適應工農生產的大躍進，適應偉大的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要求，在科學文教事業方面也來個大躍進。過去主張

“科学研究要有和尚一样安靜的环境才能够做”的老教授，現在奔走工厂、仓库等等之間，帮助生产部門研究解决有关的科学問題。但管我們还要看到：他們中間一部分人还不甘心完全抛棄自己的資产阶级思想和立場，在节节退却之中，还想在可以据守的地方站定下来抗一抗；多數人虽然在認識上接受了正确的方向，而整个世界觀的改造，特別是学术观点上的改造不是一朝一夕之間可以完成的，并且也沒有經過实践的考驗，这些認識还不巩固，还会有若干反复，我們絲毫也不能放松同他們之間的斗争。但从总的趋向来看，應該承認，我們在这个斗争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資产阶级知識分子本身已經發生了不少的变化。

总的來說，在这一年多我們对資产阶级知識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过程中，当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正确地掌握了矛盾的性質和矛盾轉化的規律时，我們的工作就得到胜利的发展；当我们稍許离开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采取了一些不正确的做法时，我們的工作就受到損失。事實證明：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对我们一切实际工作來說，都是指路的明灯。我們今后一定要繼續認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實際工作中坚决加以貫彻。这样才能使我們的工作不断地胜利前进！

社会主义民主与教育

刘佛年

(一)

一年前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划分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綫，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認為必須采用民主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也就是說在人民当中进行工作、解决矛盾，必須采取說服、教育、討論、批評的方法，决不能采用強制、压服、行政命令的方法。根据这篇文章所指示的方針而开展的全国人民的整风运动，已經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个战綫上收到了巨大的成效。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第二次會議的報告中所指出的：“在整风运动中展开的这样广泛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这样尖銳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和随之而来的这样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在任何資本主义国家中是不能設想的。从来没有一个政党能象我們无产阶级政党一样，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唯一利益，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敢于实现这样广大的民主。”

在学校里开展的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运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学校内部的矛盾和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这样

做的結果就在我們學校里實現了廣大的民主。這樣廣大的民主和資本主義國家所吹噓的學校民主是有天壤之別的。

資產階級的教育家一向吹噓他們的教育是最民主的。他們也主張在學校里搞些“民主”，象選舉、討論會、辯論會之類。他們的“民主”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美國杜威是“民主與教育”（即“民本主義與教育”）一書的作者，自認為他所提倡的教育是最民主的教育。他的門徒胡適早在1909年就把這本著作的要點介紹到中國來。胡適根據他的老師的主張，認為青年學生雖然也可以討論問題，可是只能討論“具體”的問題，就是“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到大總統的權限”之類的問題。假如“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却去高談社會主義”；不討論“一點一滴”的改良，而去討論“根本解決”社會問題，討論反帝反封建，討論革命，討論階級和階級鬥爭；那就要被他指責為“懶”“盲動”“反民主”，為“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着鼻子走”。這樣就為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捕殺進步學生和鎮壓學生運動找到了根據。資產階級的所謂“民主教育”就是這樣的一個騙局。主張“民主教育”的實用主義者平日也說學生要關心政治，但是只許他們關心“從人力車夫生計問題到大總統權限問題”的政治。在國難當頭的時候，為了維護帝國主義、買辦資本和封建勢力的利益，口口聲聲標榜民主的胡適却去誘惑學生把自己關在圖書館里“用心去研究一種絕不關係時局的學問”，去“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去“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就是說要青年學生極力脫離政治，用個人主義、名利思想去毒害他們，使他們容易成為反動派的俘虜。對於反帝的

爱国的学生則百端诬蔑、咒罵，和国民党反动派沆瀣一气，此唱彼和，迫害青年学生。这就是旧社会的“民主教育”的真相。

右派分子說西方資本主义国家的学校里面“民主”很多。究竟多在哪里呢？是的；在那里討論“从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权限問題”的自由是有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对罵，保守党和工党对罵的自由也是有的，关在图书馆里“用心研究一种絕不关系时局的學問”的自由也是有的。但是进步的自由却沒有。进步的教师被解雇、被迫害，进步的学生的集会結社被破坏，他們的言論文章沒有地方发表，他們毕业以后找不到职业，有了职业也要被赶走。进步师生的活动以不危害資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許了。因此許多教师和学生不敢談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敢暴露自己的思想。在那里有資产阶级的民主，沒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这难道不是事实嗎？

事實証明，只有在我們社会主义国家里，教师和青年学生才能享受高度的民主和自由。这一年来我国学校的师生不仅討論了許多具体問題，就是牽涉到两条道路的斗争問題，两个阶级之間的斗争問題，各种大是大非問題，如有关农业合作化問題，肃反問題，思想改造問題，三反五反問題，党的领导問題，以及国际問題的任何意見都鳴放出来了，討論了，辯論了。有哪一个資本主义国家敢照着我們的办法做呢？他們敢发动大鳴大放嗎？敢展开大爭大辯嗎？敢把一切問題都摊开来談嗎？敢暴露自己的缺点嗎？很显然，只有我們社会主义国家才敢于承認人民内部之間有各种矛盾，才能那么相信羣众的

多數，把一切矛盾都交給羣眾去辯論，去解決。只有我們能讓青年學生參加整風運動，能用鳴放與爭辯，擺事實和講道理的方式向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教育。

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學校中，師生之間，師生與行政領導之間經常存在着矛盾。可是有哪一個學校敢于鼓動羣眾充分揭露和討論這些矛盾呢？哪一個學校敢于讓學生對教師大膽提意見，被領導者對領導者儘量進行批評呢？在他們那裡矛盾常常發展成為對抗，羣眾被逼得鬧風潮，領導者則採用各種壓服手段來對付羣眾。只有在我們這個社會中，教師和行政領導者、學校的黨團組織、學生中的黨團干部才敢于引火燒身，歡迎羣眾對自己進行尖銳的批評。

為什麼在他們的學校里不敢暴露矛盾，不能解決矛盾，在我們的學校里却敢暴露，能解決呢？這就是因為我們的矛盾和他們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學校中的矛盾當然主要是階級矛盾，進步的師生和反動派之間的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的一部分，這種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必然表現為劇烈的階級鬥爭。這種矛盾決不可能通過討論、辯論、批評的方式來解決。他們的根本矛盾只能表現為對抗和衝突，矛盾的一方搞鎮壓，另一方搞革命。我們這裡就不然。我們學校里的矛盾，如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矛盾，師生之間，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都是可以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鳴放、辯論的方法得到解決的。因此我們敢于暴露矛盾，也能用這些民主的方法解決矛盾。

民主是手段，它是为經濟基础服务的。在我們社会主义社会的学校里，发揚民主，允許自由討論、辯論、批評，就能达到更好的团结，能巩固我們的社会制度。民主对我们有利，因此我們要尽量发展它。在資本主义社会的学校里，允許自由討論、批評，就要动摇他們的制度，因此統治者必然認為民主对他们不利。他們必然要限制民主自由，不給劳动人民以及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以民主自由。

世界上只有具体的民主自由。在我們的学校里，师生的任何意見都不会受到压制，而是有着大鳴大放大爭大辯的权利。但是人民的敌人不能有民主自由。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我們的敌人，就不能讓他們有民主自由。但在反右派斗争中我們也还是坚持了摆事实講道理的以理服人的原則，而不是采取簡單的粗暴的方式。这教育了广大羣众，特別是解除了中間分子的顧慮，使中間分子敢于說話。我們对于师生中的一切錯誤观点，都是采取耐心說服教育的方法。由于坚持了民主的方法，我們的学生就养成了民主的习惯、民主的风格。他們勇于发表不同的意見，进行批評，敢于自由思想，大胆辯論，堅持真理。

于是在我們的学校里就有了浓厚的民主气氛。在这里人与人之間的平等关系是在任何資本主义国家的学校里所不能設想的。因为任何不平等的态度，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官气等都要被羣众的批評的浪潮所冲垮。这里人与人之間的团结，也是資本主义国家的学校所不能設想的，因为任何矛盾、不满、磨擦、意見分歧，經過从团结愿望出发的批評、